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文学通史



第十卷 当代文学〔上〕

总主编 张炯 邓绍基 郎樱
本卷主编 张炯

江苏文艺出版社

当代文学（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通史·当代文学·全3册 / 张炯, 邓绍基,
郎樱主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399 - 5970 - 2

I. ①中… II. ①张… ②邓… ③郎… III. ①中国文
学—当代文学—文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6582 号

书 名 中国文学通史·当代文学(上)

总主编 张炯 邓绍基 郎樱
本卷主编 张炯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赵阳 伍恒山
责任校对 张松寿 汪成法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5
字 数 490 千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5970 - 2
定 价 1080.00 元(全12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节 当代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	002
第二节 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005
第三节 当代文学的历史特征.....	014
第四节 本书论述的框架与时限.....	018

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章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概况	023
第一节 基础与背景.....	024
第二节 两类评论及其阶段性分期.....	026
第二章 当代文学的主要理论思潮	035
第一节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潮.....	036
第二节 人民文艺思潮.....	038
第三节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	040
第四节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道主义思潮.....	043
第三章 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重要论争	047
第一节 建国初十七年的主要论争.....	048
第二节 新时期二十年的主要论争.....	058
第四章 跨代理论批评家(上)	073
第一节 周扬的文学理论批评.....	074

第二节 冯雪峰、邵荃麟的文学理论批评	078
第三节 林默涵、张光年的文学理论批评	085
第四节 荒煤、冯牧的文学理论批评	090
第五章 跨代理论批评家(下).....	099
第一节 茅盾的文学理论批评.....	100
第二节 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悲剧.....	104
第三节 何其芳的文学理论批评.....	106
第四节 巴人、李何林的理论批评	109
第五节 王朝闻、蔡仪、朱光潜等美学家的理论批评.....	111
第六节 以群、罗荪、王西彦、徐中玉、王元化等的评论.....	114
第七节 王瑶、唐弢等文学史家的理论批评	116
第六章 建国初期活跃的理论批评家.....	121
第一节 秦兆阳、陈涌、钟惦棐、萧殷、胡采等的理论批评	122
第二节 黄秋耘、侯金镜、唐因、唐挚等的评论	127
第三节 毛星、朱寨、洁泯、敏泽等的理论批评	132
第四节 李希凡、鲍昌、钱谷融、严家炎等的理论批评	135
第五节 马文兵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九级	140
第六节 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棍子式”批评的浮沉	142
第七章 新时期活跃的理论批评家(上).....	145
第一节 新时期批评家群的不同构成	146
第二节 理论建设与陆梅林、钱中文、张炯、李准等的著作	151
第三节 繁荣创作与阎纲、陈丹晨、刘锡诚、缪俊杰等的评论	162
第四节 新批评群体与乐黛云、刘再复、鲁枢元、林兴宅等的评论	169
第八章 新时期活跃的理论批评家(下).....	177
第一节 诗歌研究与谢冕、李元洛、杨匡汉、吴思敬等的诗论	178
第二节 小说研究与雷达、曾镇南、陈骏涛等的小说评论	185
第三节 散文研究与林非、俞元桂、余树森等的评论.....	193

第四节 戏剧理论及谭霈生、余秋雨等的评论	200
第九章 新时期文学研究著作的繁荣	209
第一节 新时期出版的理论批评丛书	210
第二节 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	214
第十章 台港澳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	219
第一节 台港澳的文学理论批评概况	220
第二节 王梦鸥、尉天骢的理论批评	223
第三节 颜元叔、叶石涛与姚一苇的理论批评	227
第四节 港澳地区的理论批评家	234

当代诗歌

第一章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概貌	239
第一节 一体多向的诗歌景观	240
第二节 不同地区的诗歌演进及诗人群	242
第三节 外来影响和诗歌民族特色的创造	246
第二章 新诗奠基者的新唱	251
第一节 郭沫若、臧克家的新作	252
第二节 冯至、卞之琳等的新作	256
第三节 艾青历劫及其新的创作高潮	259
第四节 田间、徐迟、邹荻帆、苏金伞的诗	262
第三章 来自延安的诗群	267
第一节 郭小川的丰富诗作	269
第二节 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诗作	272
第三节 闻捷的《复仇的火焰》与李季的石油诗	274
第四节 公木、何其芳、蔡其矫、严辰、戈壁舟、朱子奇	277

第四章 “七月”与“九叶”诗群	281
第一节 胡风与“七月”诗群的遭难	282
第二节 绿原、牛汉、曾卓等的新诗作	283
第三节 “九叶”诸诗人的不同遭遇	286
第四节 辛笛、唐祈、唐湜、郑敏、陈敬容、杜运燮、穆旦	287
第五章 活跃的军旅诗群	295
第一节 军旅诗群的崛起及其演变	296
第二节 从战场上走来的士兵与诗	299
第三节 公刘、白桦和西南边疆军旅诗群	300
第四节 李瑛的创作及其影响	303
第五节 崛起于五六十年代的其他军中诗人	307
第六节 新时期青年军旅诗群	310
第六章 和平建设时期的歌手	313
第一节 和平建设时期的赞歌	314
第二节 张志民和北京地区诗人	315
第三节 雁翼、梁上泉等巴蜀诗人	317
第四节 严阵、沙白等江淮诗人	320
第五节 其他诗人和工农歌手	321
第七章 大跃进民歌运动	323
第一节 大跃进民歌运动与《红旗歌谣》	324
第二节 民歌歧途与“假、大、空”诗风	327
第三节 诗歌发展方向与新格律诗的讨论	328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诗歌	335
第一节 诗作萧条与所谓“小靳庄民歌”	336
第二节 “地下诗歌”的涌动	338
第三节 天安门诗歌运动	339

第九章 “五七”历劫者的归来之歌	343
第一节 独特的生活经历和诗歌主题	344
第二节 邵燕祥、流沙河、孙静轩等诗人	346
第三节 昌耀、梁南、赵恺、林希、吕剑等的诗	351
第十章 大西北的“新边塞诗”	359
第一节 “新边塞诗群”的形成	360
第二节 “新边塞诗”的总体特征	361
第三节 杨牧、周涛、章德益的创作	363
第十一章 “新诗潮”和其他面向现实的诗人	367
第一节 “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	368
第二节 关于“朦胧诗”的争论	370
第三节 北岛、舒婷等人的诗作	373
第四节 同辈面向现实的诗人群	379
第十二章 多向的“后新诗潮”	385
第一节 “新生代”与“校园诗歌”	386
第二节 “城市生活流”和纯诗	389
第三节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391
第四节 女性主义诗歌	396
第十三章 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歌唱	399
第一节 少数民族诗人的茁壮成长及其话语特征	400
第二节 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等蒙古族诗人	403
第三节 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等维吾尔族诗人	406
第四节 晓雪、金哲、黄永玉、胡昭等各族诗人	408
第五节 吉狄马加、南永前等新时期活跃的诗人	413
第六节 韦其麟、汪承栋、包玉堂等的叙事诗	418

第七节 傣族民间歌手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	422
第十四章 台湾当代诗歌(上)	425
第一节 台湾当代诗歌的艺术基础与生存环境	426
第二节 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与论争	429
第三节 纪弦、郑愁予等“现代派”诗人	434
第四节 覃子豪、余光中等“蓝星”诗人	438
第五节 洛夫、痖弦等“创世纪”诗人	443
第十五章 台湾当代诗歌(下)	449
第一节 现实主义诗潮的中兴	450
第二节 “笠”与“葡萄园”诗人	454
第三节 七十年代成长的本土诗人	459
第四节 诗坛的多元走向和“新世代”诗人	463
第十六章 香港、澳门的当代诗歌	471
第一节 当代香港新诗发展的环境和分期	472
第二节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诗坛和诗人	474
第三节 七八十年代香港诗坛的新格局	480
第四节 澳门的当代诗歌	490
第十七章 毛泽东诗词与旧体诗的创作	499
第一节 毛泽东的诗歌主张与诗词成就	500
第二节 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创作	505
第三节 学者及新诗人的旧体诗词	511
本卷后记	514
卷后索引	515

绪
论

第一节 当代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

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我国版图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它是我国文学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人民文艺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都产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的阶段。

每一代文学艺术都是自己历史土壤上生长的精神的花朵。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与产生它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诗人兼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曾在他的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民主革命阶段的结束，也宣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到来。香港已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实现回归，澳门也于一九九九年回到祖国怀抱。尽管大陆与台湾还没有统一，但毕竟统一已属全国各族各地区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从五十年代起，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踏着前人未曾走过的崎岖道路，在雷霆风暴中，在和平建设的探索中不断前进。不但使整个国家的社会生

活产生深刻的变革,也使五十六个兄弟民族^①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和当代文学走向空前的繁荣。

中国不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幅员广阔、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我国大陆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云南有的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西藏地区在五十年代还维持着农奴制。旧中国经过长期战乱,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不发达。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抗美援朝、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几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各方面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一九五七年后,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成果累累,虽说由于“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急躁冒进,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来更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不但导致七十年代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也使文化建设和社会艺术生产在一段时间受到很大破坏,但毕竟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工业化的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确立了新的政治、思想路线,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政治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从八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文化事业也相应有很大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科学技术许多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期间,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深刻的,尽管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已向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新中国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也迥异于旧中国。开国之初,大陆承继了旧中国多元的文化遗产。其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的进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传播到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它主导下对旧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从而促进了新的社会风气和新的时代精神、思想风貌的形成。五十年代虽也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却实际没有完全执行。而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思想解放、艺术民主和中西文化产生自“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撞击,成为这时期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① 当代中国境内组成中华民族的共有如下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汉、满、蒙古、回、藏、壮、朝鲜、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撒拉、布朗、毛南、苗、瑶、侗、土家、彝、羌、白、傣、景颇、纳西、布依、哈尼、佤、仡佬、拉祜、傈僳、畲、京、黎、水、土、高山、东乡、达斡尔、仫佬、普米、怒、阿昌、鄂温克、德昂、基诺、裕固、保安、门巴、独龙、鄂伦春、塔塔尔、俄罗斯、珞巴、赫哲。

倡导文学艺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政策,则是改革开放时期文艺发展的主导趋向。这种状况,自然给文学艺术带来思想活跃和创作自由,也带来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向推动。当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必然会有多元走向,并产生正负面影响。在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被提倡的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也有所滋长,从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严重的挑战。

上述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国大陆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体制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的建立,大多数文学艺术工作者都被组织起来,团结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改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中,党和政府可以通过上述民间团体实施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所有的出版机构也先后都被纳入国营的体制。这样,专业作家和出版工作者都领取国家的工资,不虞衣食,因而作家创作什么和出版社出版什么,都不能不受国家意志的制约和影响。文学作品的消费,固然也有读者的需求起作用,但国家舆论和文学批评的导向,起着更大的作用。党和政府更要求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此相悖的文艺作品便很难存在。这种状况的改变则发生在八十年代初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邓小平号召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么写不要横加干预”之后,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也更强调自己服务于作家艺术家的功能。而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版社先后改为企业管理,日益强调经济效益,追求图书在读者中的销量,这样市场需求便成为一只强有力看不见的手,导引着作家艺术家创作什么和怎么创作。虽然党和政府的政治吁求,也还继续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无可讳言,正由于文艺生产与消费体制的变革,导致我国文艺从建国初的多元状态而后逐步走向一元,乃至走向“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化”,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则又从一元状态呈现出多种形态、多种观念和多种需求的分流。但纵观五十年来我国文艺的发展,居于文坛主导地位的则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潮流。

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港澳地区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形态都与大陆有很大的差异。台湾曾受日本五十年的占领和统治,日本的文化侵略曾以“皇民化”的

形式产生影响,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长期坚持反共,实行思想统治,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条件地开放报禁、党禁,允许与大陆交流;港澳地区因受英国和葡萄牙长期的殖民统治,比较之下,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近半个世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仍然是台港澳地区文化的突出特征。但无论台湾还是港澳地区,毕竟同属中华文化的母系,不仅语言文字相通,中华传统文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根深蒂固,因而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大陆也异中有同。

由于占有十三亿人口的我国大陆在当代所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大陆文学为主体的我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也就与旧中国有异。除台港澳地区外,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第二节 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就新中国文学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一) 初步向荣阶段(1949—1956)

这是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头八年,其间虽然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和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的艰难,但社会政治稳定,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整个社会蒸蒸日上,文学艺术也欣欣向荣。这阶段面临的任务是要在清除旧的地基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学艺术。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成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动员大会。这次大会既标志着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革命文艺队伍的会师,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大会提出加强团结,清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文艺及其影响,改造旧文艺,建设人民的新文艺的号召,奠定了此后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这次

大会极为重视，毛泽东亲临讲话，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由郭沫若致开幕词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和周扬分别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和《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的成就与经验。大会通过决议和宣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可以说，这次会议迎来了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的时代，在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宽阔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七日，在首都北京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迎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形势下举行的。周恩来到会作了政治报告，周扬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回顾了近四年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成就和问题，号召在新的形势下正确对待我国文化遗产和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继续前进。会上改选了文联及其各协会的领导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仍由茅盾任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满族）、冯雪峰、邵荃麟任副主席。

八年间在两次大会的推动下，文学战线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清除旧文艺的影响方面，禁演了传播西方腐朽思想的电影，清理了传统戏曲剧目，按照毛泽东主张的“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的原则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剧进行改造，并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在文学艺术领域先后发动了多次思想文化批判，包括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这些批判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传播，但其“左”的倾向，也给文学艺术的发展造成相当的危害。而这时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胜利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更大大鼓舞了广大作家、艺术家，促进了新时代的题材、主题和形式、风格都较为丰富的创作。八年间，诗歌中颂歌和战歌居于主导地位，郭沫若、胡风、冯至、艾青、臧克家、何其芳、田间等建国前便已著名的诗人，都情不自禁地为新中国的诞生高唱激情洋溢的赞颂，而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年轻诗人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和更为年轻的李瑛、公刘、未央、邵燕祥、严阵等则以充满战斗的情思去歌唱新中国的建设或歌吟保家卫国的

英勇。巴金、魏巍、靳以、菡子、华山、魏钢焰等众多散文家则多投身朝鲜战争前线或祖国建设前沿,以速写和报告文学为前方勇士与后方建设者高奏一曲曲感人的凯歌。共和国最初一批长篇小说像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原动力》、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及康濯、马烽、峻青、李准(蒙古族)、王蒙、刘绍棠等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也都涌现于这一时期。戏剧方面老舍以《龙须沟》、《茶馆》^①等名作构成他的又一创作高潮。像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夏衍的《考验》、曹禺的《明朗的天》和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多幕话剧名作以及电影《钢铁战士》、《董存瑞》、戏曲《刘巧儿》、《十五贯》,还有少数民族作家李乔(彝族)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玛拉沁夫(蒙古族)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韦其麟(壮族)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和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饶阶巴桑(藏族)等诗人的一些优秀抒情诗也产生于这八年。其间,不但文学逐步欣欣向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时代精神通过文艺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日益高扬,文坛充满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都洋溢着一片明朗的色彩和豪迈的激情。

很可惜,由于“左”的倾向不断滋长并在多次批判运动中给文艺工作者带来伤害,特别是对胡风及其友人的批判和错误处理,将他们打成所谓“反革命阴谋集团”,而一九五七年夏秋间开展的并被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又使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受到不应有的迫害,从而文坛初步向荣的一派春光顿受挫折。

(二) 艰难发展阶段(1957—1966)

这是被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其间,由于“左倾”思潮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坚持,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经过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重又走向恢复和发展。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周恩来等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曾经极力纠正“左”的偏差,也初见成效。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① 《茶馆》发表于1957年《收获》创刊号。在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上初次演出。

会尽管仍有“左”的表现,对文学的发展则有积极的作用。会上周扬、茅盾分别作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和《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跃进》的报告,在回顾成绩和探讨缺失的同时,对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对创造新英雄人物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向等问题,都有较为正面的论述。大会选举郭沫若为文联主席,茅盾、周扬、巴金、老舍、许广平、田汉等十五人为副主席,同时中国作家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周扬、巴金、柯仲平、老舍、邵荃麟、刘白羽为副主席。

但是一九六二年后,由于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以及中苏分裂,加之“反帝”、“反修”和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口号相继被提出,国家沿着“左”的思想轨道滑向“文化大革命”,乃属势所必然。尤其是六十年代初,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插手文艺界^①,开始全盘否定了以往革命文艺的成绩,并发起对于许多作品包括《海瑞罢官》的批判,这就使复苏的文艺浪潮又很快落入低谷。

这十年文学领域尽管描写现实的创作步履维艰,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大量作品难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许多作家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领域,还是创作出一系列相当成功的作品。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在诗歌方面都推出大批佳作,在诗歌形式的民族化和诗歌意象的营造上尤有建树。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将军三部曲》,贺敬之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以及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等,都属一时脍炙人口之作。散文在这时期也较为发达,除报道先进人物事迹的报告文学外,短的抒情叙事散文和杂文都涌现不少佳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写景散文,杨朔的

^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江青插手文艺界,曾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些片面反映情况的材料。毛泽东据此曾作了两次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